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建设部科技发展司联合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5870362
(89)国科金外资助第246号

日本丰田财团助成研究报告书
报告书编号: 027
助成编号: 90-III-025
发行年月: 1993年10月

中國近代建築總覽

北京篇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OF MODERN CHINA
BEIJING

主 編

汪 坦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会
藤森照信 日本亚细亚近代建筑史研究会

本 篇 主 編

王世仁 张复合 村松伸 井上直美

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

86.0428

9400669

中国近代建筑总览

北 京 篇

主 编

王世仁 张复合 村松伸 井上直美

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5 号

本书系《中国近代建筑总览》丛书中的一篇——北京篇。它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的科研项目，并得到日本丰田财团资助，由中、日双方近代建筑史研究会合作研究的成果之一，对亚洲及世界近代建筑史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并对建筑保护、修复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本篇内容包括：近代建筑概说、实测报告、近代建筑一览表、分布图、调查表及英文摘要等。

本书可供城市建设、规划、建筑历史研究人员、设计人员及教学等方面参考。

* * *

责任编辑 曲士蕴

中国近代建筑总览

主编 汪坦（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会）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邮政编码：100084 电话：2564174

藤森照信（日本亚细亚近代建筑史研究会）

日本东京都港区六本木 7-22-1 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

邮政编码：106 电话：03-3402-6231

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北京篇

主编 王世仁 张复合 村松伸 井上直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发行日期 1993 年 10 月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 16 1/4 字数：327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40 册 定价：11.80 元

ISBN 7-112-02102-2/TU·1606

(7122)

前 言

《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北京篇》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会和日本亚细亚近代建筑史研究会第三年度（1990年11月～1991年10月）合作计划的一部分，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通力协作，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建设部科技发展司和日本丰田财团基金会的支持赞助下完成的。

在此之前，曾有梁思成先生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建筑”论文（未公开发表）；1956年7月刘先觉（现东南大学教授）写研究生论文“中国近百年的建筑”时，曾对北京近代建筑进行了调查。1957年5～6月间，梁思成先生、傅熹年、王其明等曾调查了国会、陆军部、海军部、劝业场、大栅栏商业区、国货陈列馆、农事试验场、大陆银行等，并有简单的报告。1958年10月，在当时的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主持下，进行了近二十个省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辑编，其中包括北京。这些成果，收入了1959年11月编印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王世仁等又进行了补充调查，并经讨论整理后于1962年10月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1990年上半年，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王世仁、沈阳、侯兆年、范军又对市区近代建筑进行一般普查，制表并摄有照片。

这次共收集了356项建筑，其中包括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此之前对北京基督教堂建筑、东交民巷使馆区、大栅栏商业建筑、协和医学院校园建筑的调查研究、对横滨正金银行的实测，以及在清华大学基建处协助下对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的实测，在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协助下对旧日本公使馆、瑞蚨祥绸布店、北京大学女生宿舍、海军部、陆军部等重要建筑的实测。这次调研的主要参加者有日本东京大学西泽泰彦（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进修），清华大学楼庆西、张复合、吕舟、赖德霖、吴耀东、陈伯冲，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的侯兆年等，还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一些教师、研究生和学生们参加（名单见实测报告）。

这项工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是不可能展开的。在资料文献查阅中，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和图书室等都给予了极为宝贵的协助。北京市规划局、文化局、文物局、房管局和地方志诸方面多年的辛勤工作都为我们的调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深感“协同互助精神”在一切领域内的重要性。

1991年3月17日，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建筑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优秀近代建筑评议会。为了妥善保护，在各地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筛选后申报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建筑名单的基础上，邀请专家评议，已初步选出

一定数量的优秀近代建筑，将依照法律程序经国务院裁定后予以公布。这就告诉我们有责任要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加快步伐，为保护建筑文化遗产提供确实可靠的根据。

到1994年将有十六个城市的“总览”出版，这尽管还只能是“前锋”，但我们已经大致感受到这项研究是非常必要的。1840~1949年时期，中国处于历史上灾难深重、内忧外患交加、人民极端困苦阶段。即使如此，中国的建筑文化在外来力量的强烈的冲击下，因循传统的情绪也不容忽视，依旧蕴藏着属于自我特征的智慧。真切的历史事实是无与伦比的佐证。这次和藤森先生的协作，具体地加强了我对这段建筑历史的观点：它是一个伟大的转折阶段。我们看到了我国相当数量有创造天赋的建筑师、高超组织能力的营造专家，看到了许多无名的、显示出众才华和精良技术的作品以及极为丰富的某些文献资料。这些鼓舞我们继续努力！

短短的四年内，我们结识了村松贞次郎先生（我们这次协作的倡议者）、藤森照信先生等许多日本近代建筑史专家，使我们获益匪浅。我向各位先生们表示感谢。丰田财团基金会热心赞助我国建筑文化事业，在此我向他们致敬。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目 录

前言	汪坦
北京近代建筑概说	王世仁、张复合 (1)
实测报告 1: 日本公使馆旧馆	西泽泰彦执笔 (27)
实测报告 2: 清末陆军部南楼	赖德霖执笔 (39)
实测报告 3: 瑞蚨祥绸布店	吴耀东执笔 (57)
实测报告 4: 北京大学女生宿舍	吕舟执笔 (65)
北京近代建筑一览表及分布图	(74)
北京近代建筑调查表	(91)
附录:	
A: 北京近代建筑资料目录	(217)
B: 日本方面所藏北京近代建筑资料目录	(223)
C: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有关北京近代建筑图纸资料目录	(225)
D-1: 北京近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7)
C-2: 北京近代建筑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27)
C-3: 专家建议的北京近代优秀建筑	(230)

E: 北京近代建筑大事记 (230)

英文摘要..... (251)

北京近代建筑概说

王世仁 张复合

根据考古资料,商周时期北京开始建城,其后均为各王朝在北方的重要都邑。除位于房山区琉璃河的古城遗址可以确指为商周城址外,其它金代以前古城都经过后世沿用改造,极少发现完整的城址。辽朝为陪都“南京”,其址在今北京城区西南部。金朝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1151~1153年)扩展辽南京,建成为皇都——“中都”。元朝在金中都东北郊另建新城,名“大都”。明朝改筑元大都,并由清朝沿用,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前均为国家首都,名“北京”。1928年起改称“北平”;日伪占领时期(1937~1945年)一度又称“北京”;1945~1949年仍名“北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为国家首都,名“北京”,属国务院直辖市建制。

从明末清初欧洲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清康熙、乾隆时宫廷吸收西方科学艺术,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军事政治风云而大量涌入西方文化,北京一直处于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矛盾中心。北京的近代建筑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段历史某些重要的方面,许多新鲜的、独特的现象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重要篇章。把这些新鲜的、独特的现象加以记录整理,归纳分析,正是编写北京近代建筑史的主题所在。

为了突出近代建筑新鲜的、独特的个性,应当在不同阶段中突出重点事件和重点建筑。但各阶段的绝对年代不可能“一刀切”,因此下述发展阶段的划分也只是大体的轮廓,容有个别事件、个别建筑超出了划定的年代。

一、二十世纪初年以前:西方建筑开始传入北京时期

本阶段时间较长,西方建筑的传入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突出。

(一) 基督教堂建筑

基督教在唐代曾传入中国,当时名“景教”,但建筑实物已无迹可寻。蒙古西征,元代沟通欧亚大陆,基督教又一度传入中国,当时称“十字教”,也称“也里可温教”。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罗马教皇派方济各教士意大利人蒙特·科维诺(Giovanni di Monte Covino, 1247~1328)来华传教,于1299年和1305年在大都建了两所教堂。^①据考证,第二座教堂在今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一带,即大都的南城墙根,

“计有围墙、房屋、简单办公用房和一座可容二百人的礼拜堂，……并且有一个红十字架高竖屋顶”。^②具体式样虽难以考证，但根据元代传入的伊斯兰教建筑遗物（如泉州清净寺大门、杭州凤凰寺礼拜殿穹顶）均为阿拉伯风格，记载中大都宫殿里也有一些非传统的形式，可以推测这座“罗马天主教教堂”也有可能采取欧洲形式，或某些构件、装饰带有欧洲风格。如是，则蒙特·科维诺是把欧洲建筑形式带到北京的第一人，这座罗马天主教教堂是欧洲建筑进入北京的第一座。

基督教包括三大派系，即隶属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西方公教派）、东正教（东方正教派）和脱离罗马教廷的耶稣教（新教）。它们在北京都有教堂建筑。

明代中期以后，厉行海禁，基督教只能通过葡萄牙殖民者占据的澳门逐渐向大陆渗透。至万历年间，利玛窦经皇帝特准来北京定居，才奠定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基础，从此至二十世纪初的三百年间，随着北京的政治风云变化，教堂建筑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

利玛窦（意大利人，字泰西，Matthieu Ricci，1552～1610）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来京，1605年在宣武门内的住处建礼拜堂，即后来“南堂”的前身。外形为中国传统式样，内部装饰已有欧洲风格。^③1610年利玛窦死后，万历皇帝赐地于阜成门外马尾沟建造坟茔。墓地建筑由利玛窦继承人龙华民（字精华，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指导设计，“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圜；方若台圯，圜若断木”，^④细部装饰也受西洋影响，是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式坟茔。

1650年德籍神父汤若望（字道末，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改建南堂，仍“按中国式样而造”，^⑤但“堂牖器饰，如其国制”。^⑥1652年建成。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皇帝赐地给两位神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在王府井利用民宅设堂，即后来的“东堂”。康熙元年（1662年）改为西式。

康熙皇帝很注重吸收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教士借介绍科技之机也获得朝廷的青睐。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法国耶稣会士洪若、刘应得到皇帝“于皇城西安门内赐广厦一所”，“飭工部鸠工修葺”，^⑦名“救世堂”，即后来的“北堂”之前身。^⑧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把与沙俄雅克萨战役中俘虏的59名战俘带到北京，集中居住在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并将其地的一所关帝庙改作东正教堂，当时北京人称为“罗刹庙”或俄罗斯“北馆”。1689年后，沙俄教区命名为“圣尼古拉堂”（又名“圣索菲亚堂”，后改称“圣母安息堂”），^⑨这是北京的第一所东正教堂。

第二时期：

在十八世纪的约一百年中，北京的基督教堂陆续扩大规模，改建成欧式。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救世堂在皇城内蚕池口落成。“堂长七丈五尺，宽三丈二尺，高三丈。堂内无明柱。贴墙有半圆柱十六楹，彩以绿色，柱顶雕有花草；柱

顶之上，覆有半圆柱十六楹。每柱各高一丈二尺。……堂之窗牖左右各六，皆系圆顶。……堂之前面，镌有‘敕建天主堂’五字匾额一方。”^⑩

南堂在1703~1712年间重建，“徐日升与闵明我予以改造，成为欧洲式”。^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京师大地震，新建南堂与东堂均坍塌。次年南堂重建，以利博明修士（Fr. F. Maggi）为建筑师。据载，此堂为欧洲当时盛行的巴洛克（Baroque）式，华丽异常。^⑫利博明同时也为东堂的重建进行了设计。^⑬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俄国正式委派了“北京传教士团”，并在东江米巷（东交民巷）建立了俄罗斯“南馆”，^⑭1732年在南馆建造了东正教“圣玛利亚教堂”（一名“奉献节教堂”）。

雍正元年（1723年），意大利人德理格（Teodoricus Redrini, 1670~1746）在西直门内大街路南建“西堂”。^⑮

1721年重建的南堂在雍正八年（1730年）因地震倾坏，随之由朝廷赐银一千两重修。^⑯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因大火焚毁，朝廷再赐银一万两重建。^⑰至此，南堂已经历了四次重建。据记载，新建的南堂仍为巴洛克式。^⑱

第三时期：

在十九世纪的约一百年中，由于政治风浪的冲击，北京的基督教堂也经历了大起大落。

清嘉庆、道光两朝对基督教采取高压手段，限制极严。嘉庆十二年（1807年）对教会大加清洗，当年东堂失火，“虽未焚坍，亦令拆毁，飭修士等尽移南堂居住”。^⑲十六年（1811年）西堂被毁。道光七年（1827年）籍没、拆毁救世堂，地基出售。^⑳这时的北京城内，只有南堂还勉强存在着。但是，随着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中法、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以及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北京城的大门彻底被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除了旧有的天主教堂和东正教堂外，耶稣教（新教）各派也陆续在北京建堂。

1860年清廷归还救世堂，1864年重建，旋即被烧毁，数月后复建。^㉑1865年5月1日北堂（救世堂）大堂奠基，1866年1月1日落成。“有法人布里耶者，晓于工料，画堵为式。……堂之格局仍照圣教第十三世之时样建成”。^㉒又“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㉓人称“百鸟堂”。^㉔1886年，慈禧太后以北堂逼近中海，重建后教堂高大，影响扩建西苑，乃与法公使签订《迁堂条约》，两年后将北堂迁至西什库，于1888年建成，人称“西什库堂”。迁建后的北堂是北京最大的一座教堂，为法国哥特式。^㉕

在此期间，各教堂陆续重建、扩建。1867年西堂重建，为哥特式；1880~1884年东堂重建，为罗马（文艺复兴）式；^㉖东正教北馆、南馆的教堂也加以改建。

第四时期：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北京教堂除北堂和位于东交民巷内的东正教堂受损外，其它全部被毁。随着《辛丑条约》（1901）的签订，由清廷赔偿后又全部加以重建、扩建。1900年北堂修整，钟楼加高；1902~1904年南堂重建；1904年东堂重建；1912

年西堂重建。与此同时，阜成门外二里沟的传教士墓园（即明代的利玛窦墓园）扩大，教堂及修道院重建。东正教北馆的圣尼古拉堂也于此时重建（命名“致命堂”）；又于安定门外扩建俄人墓园，新建教堂一所（“圣母堂”，1918年前后建成）。致命堂为典型的十字形平面东正教堂，堂顶上有五个带十字架的穹顶，室内装饰华丽。^{②7}1901年法国神父在东交民巷建圣米厄尔堂，日后又有扩建；该堂规模较小，专供居住在东交民巷的外国教徒使用，为哥特式。

耶稣教（新教）在1900年以后也迅速建造教堂。1909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刘海澜（Hiram Harrison Lowry, 1843—1924）在崇文门内建亚斯立堂（Asbury Church），^{②8}附属有中学、小学、医院，为美国折衷式风格。其后，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青年会等都有类似的建筑。一般说来，耶稣教的建筑规模都小于天主教。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耶稣教建筑，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即开始探索中西结合的形式。最早的一座是南沟沿（今佟麟阁路）中华圣公会教堂（又名“安立甘教堂”，Anglican），1907年建，由主教史嘉乐（Charles Perry Scott, 1847~1929）请人画图，雇北京工匠建造。^{②9}它“是北京最早的中国‘宫殿式’教堂”，平面为十字形，屋顶为中国式坡顶，顶部有两个八角亭子作为天窗和钟楼。^{③0}与这座教堂风格类似的尚有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1922年建成），三层楼上坡屋顶作歇山式，南端突起一个中国方塔式钟楼。另外有一些小型教堂也多采用中国式屋顶。

（二）乾隆时期的欧式建筑

清初，通过传教士的介绍，皇帝对西方科技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乾隆时位于广州的商馆“十三行”已经是欧式建筑^{③1}。

为接待乾隆南巡，扬州私家园林也引进了一些欧洲建筑手法。如怡性堂“左构子舍，仿泰西营造法”，室内作半景画面，有丰富的层次，主景能旋转，与自鸣钟相联，钟鸣景转；屋顶作天窗，将室外天空纳入室内；又在墙面镶大镜，以加深室内景象。^{③2}又如澄碧堂，仿广州“十三行”的“碧堂”。^{③3}又如九峰园中有“两卷厅”，安三尺见方玻璃，名为“玻璃厅”；谷雨轩旁小屋有车轮形大圆窗名“蜘蛛网”，即仿哥特式教堂正面的巨大圆窗。^{③4}又如水竹居，室内有用“西洋画”（透视）画成的装修；同时“作水法，以锡为筒一百四十有二伏地下，下置木桶高三尺，水由锡筒中行至口…”。^{③5}

在宫廷中，早在雍正五年（1727年）“传旨做水法上翎毛风扇一份，安于风扇室”，^{③6}此处即后来由乾隆命名的“圆明园四十景”里“水木明瑟”中的风扇室。乾隆在题名注文中说，“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转风扇”，^{③7}大约指的就是用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引用的欧洲“龙尾车”提水设备。龙尾车即螺旋叶片推进器，利用水位差通过齿轮驱动叶片提水或推水，进而转动风扇。龙尾车在一些地方俗称“绞刀”或“绞龙”。

“水木明瑟”的泰西水法规模不大。至乾隆十至二十四年（1745—1759年），由于在长春园里仿造欧式园林喷泉，水法才大规模兴造起来，并因此建筑了一组规模

颇大的“西洋楼”建筑群。第一座西洋楼名“谐奇趣”，其后陆续建筑了“海晏堂”和“远瀛观”（包括“大水法”、“观水法”），它们是西洋楼建筑群的主体，都是以喷泉为主题的欧式园林府邸建筑。

西洋楼位于长春园最北端，自成一区，东西长约 840m，平面成丁字尺形，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南北长约 350m，东西宽约 90m，自南往北主要建筑有：线法桥、谐奇趣、蓄水楼、花园门、万花阵。东段东西长约 750m，南北宽约 70m，自西往东主要建筑有：养雀笼、方外观、竹亭、海晏堂、大水法、观水法、远瀛观、线法山西门、线法山（转马台）、线法山东门、方河、线法画（线法墙）。^③

西洋楼水法的设计者是法国人蒋友仁（字德翔，Michel Benoist，1715～1774）；建筑设计者是意大利人郎世宁（字若瑟，Joseph Castiglione，1688～1766）、法国人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波希米亚（捷克）人艾启蒙（P. Ignace Sichelbarth，1708～1780）和佛罗伦萨的建筑师利博明（Bonaventura Maggi）；园林绿化设计者是法国人汤执中（F. Pierre D'Incarville，?～1757）。他们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④

和整个圆明园的设计构思一样，长春园西洋楼也是乾隆皇帝设想把欧洲优秀建筑“移天缩地在君怀”、^⑤“并教缩入一壶中”。^⑥这里有豪华的宫廷府邸（海晏堂、远瀛观），有水池、喷泉、叠泉景物（谐奇趣、大水法、观水法），有点景小品建筑（养雀笼，花园门，线法山东、西门，竹亭），有迷离曲折的迷宫（万花阵、线法山），有加深景物层次的半景透视景片（线法桥、线法墙、方河），有经过修剪的草坪、绿篱、树林，还有石雕、铜铸的动物和人物像（风俗所限，没有裸体）。举凡当时意大利和法国宫廷府邸园林中的题材、手法，都浓缩在这里了。

所有建筑物都是欧洲结构体系。柱式、栏杆、女墙、台阶大多使用汉白玉，砖墙身或嵌彩色琉璃花砖，或刷粉红颜色，或镶石刻花饰。屋顶为中国的琉璃瓦，但不反宇起翘。某些细部雕塑中杂有中国式样。这批建筑基本上属于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但由于它们多是模仿欧洲流行的法国园林，而洛可可（Rocco）风格正在法国兴起，所以也受到这种风格的影响；同时又夹杂着传教士和中国工匠对上述两类风格的理解和发挥。总的说来，这是一组有浓郁的欧洲古典风格的园林建筑。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由耶稣会教士晁俊秀（P. Michael Bourgeois）主持，曾师从郎世宁的二、三个弟子绘制成西洋楼铜版画 20 幅。^⑦铜版画采用不太标准的透视画法，表现得相当细致。但画与现存的遗址对照，两者还有一些差别，当是绘画中有些改动，或绘画完成后建筑又有修缮改动，但大体上差别不是很大。西洋楼在 1860 年与圆明园同时被烧毁，1870 年前后有德国人奥尔末（Ernest Ohlmer，1847～1927）摄有“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照片 14 幅。^⑧铜版画与这批照片为现存最可靠的西洋楼原始形象资料。

西洋楼的建筑也给清朝官式营造则例增加了新的内容。现北京图书馆藏《圆明园工程作法》中有“界西洋索子锦”、“西洋如意栏杆”、“有楼子西洋拨浪”、“无楼

子西洋拨浪”、“西洋勾”、“西洋墙”、“西洋蹈躁级石”等名目。后来这些做法成为宫廷洋式建筑的标准，并影响到民间。在清代末年盛行于北京的一些洋式店面、洋式装修和洋式公共建筑，大都仿自圆明园的西洋楼，以至民间俗称洋式建筑为“西洋楼式”或“圆明园式”。

（三）清末宫廷洋风建筑

如果说，长春园西洋楼的出现还只是出于乾隆皇帝“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占有欲心理，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十九世纪末叶以后在宫廷中兴起的建筑洋风，则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北京近代建筑发展中的必然现象。

“洋务派”掌握着军政大权，“维新”浪潮冲击着典章观念，西方新奇舒适的工艺制品也吸引着帝后王公，于是洋风一时成为上层人物生活的时尚。先是“小改小革”，如窗户上普遍安装了大块玻璃，门窗扇安装了新式合页，房屋前添建平顶游廊；有一些木装修、砖石雕刻和建筑小品引进西方造型及纹样：宫廷苏式彩画一改以往比较严谨的构图，大量出现“西洋画”，即用透视和油画手法表现景物的明暗层次。继而在中南海和颐和园设发电机，宫殿里安装了洋式吊灯，接着摆进了路易十四式的家具陈设（如御花园中的养性殿、翊坤宫、长春宫等）。与此同时，在禁苑中建起了洋楼，其中三项比较重要。

1. 颐和园清晏舫

清乾隆十五至三十年（1750—1765年）建成的清漪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重建，1888年改称“颐和园”。园内昆明湖西北岸原有1755年在圆静寺放生台遗址上建造的石舫，船体使用云南大理石，上有中国式木构舱楼。颐和园重建时，仿“翔凤”号火轮，改为洋式舱楼，并在船体两侧加石刻机轮，1893年建成，命名为“清晏舫”。舱楼有“洋式楼房三间”、“洋式平台楼四间”、“平台抱厦一间”、“抱厦一间”。⁴⁵这座舱楼虽是木构建筑，但木构件外面油刷成大理石纹样；券形窗嵌五色玻璃，屋顶檐口作砖雕花饰，地面铺彩色花砖。总体形象仿自长春园西洋楼，但材料工艺远逊。

2. 西苑海晏堂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联军司令部进驻西苑（中南海）仪銮殿。1901年4月17日仪銮殿被火焚毁，6、7月间奕劻、李鸿章接受外国公使建议，电奏在西安的慈禧：“有一国使宣称，若将仪銮殿已毁基址改建洋房，一切照西式办理，专为接见外臣各使，必无争论”。⁴⁶1902年慈禧、光绪回京，“遂命工部依其意旨，制新殿之模型，……参用西制”。⁴⁷

海晏堂已于六十年代初拆除，据清宫档案《中海修建海晏堂工丈尺做法清册》载，这一组建筑包括：海晏堂洋式楼一座，三间，前后双步廊，通高三丈一尺三寸；台基面阔六丈，进深六丈八尺。两山拐角洋式楼各一座，南山接平台抱厦各一座。海晏堂前东、西点景洋式楼各一座。海晏堂后仿俄馆洋式楼一座，十三间，通阔十三丈二尺，进深六丈二尺。仿俄馆后东、西点景洋式楼各一座。海晏堂前蝠式水池一

座，池周长二十丈四尺；水池内两边摆十二属相古铜兽首人身像十二座，左为鼠牛虎兔龙蛇，右为马羊猴鸡狗猪，身高二尺五寸；池内正中古铜花瓶一座，山石一堆；池上木板桥一座；池前两边洋式石幢二座。海晏堂四面围墙，南面、东南和仿俄馆后北面洋式花门各一座，西边开屏门一座、角门三座。^{④⑤}

这组建筑于1904年竣工，耗银500多万两。它基本上是仿乾隆时长春园的海晏堂而加以简化，如将入口改在底层，取消了原海晏堂直上二层的法国式弧形阶梯；此外，装饰工艺和材料也大不如原物豪华。

3. 乐善园畅观楼

清朝帝后由京城往颐和园（清漪园），经常在西直门外高粱桥以西乘船，由长河抵达昆明湖。登船处建有行宫，名“倚虹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在长河边的乐善园长河北岸新建“畅观楼”为行宫^⑥，隔河建“鬯春堂”为随行官员值房。慈禧等去颐和园时在此休息换船。

畅观楼是北京当时流行的砖木混合结构二层洋房。周围有深外廊，山墙面向前开窗，屋顶内为阁楼；红砖墙体，局部抹灰及灰塑线脚，并夹以砖雕花饰；爱奥尼（Ionic）柱式；曲线形山墙上缀以球形装饰。正面两端转角处为八角形楼阁，上覆拱形铁皮顶（东端为三层平顶，疑是后来改建）。从总体上看，富有中欧大府邸的风格。

二、二十世纪初至二十年代以前：

北京近代城市建设和建筑形成时期

本阶段是北京近代建筑历史中的主要时期，处于封建清王朝和中华民国的社会大交替之中，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在以下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皇都禁地开放、现代市政建设开始

北京的城墙城门本属禁地，首先被铁路打开。1896年京汉（口）路通车，1898年京奉（天）路通车，1900年京通（州）路通车，1909年京张（家口）路通车；1915年修筑环城铁路，同年拆除正阳门瓮城；后扩修京汉路，于1931年拆除宣武门瓮城箭楼。至此，北京城墙被拆出七个豁口，一座瓮城被穿通（崇文门），一座箭楼（宣武门）被拆除，两座角楼和五座箭楼孤悬城外，又在城墙脚下建造了大小15座洋式火车站。1923年打通新华街，1937年东、西长安街直穿城外，古城墙上又添了三处豁口。

皇城墙在民国后陆续拆除，至1922年前，东、西、北三面全部拆完，只余地安、西安二门。南面皇城墙在打通南长街、南池子后辟出两处券门通道，南河沿填平后又拆出一处通道路口。1913年中南海成为总统府后，拆除宝月楼前皇墙城，改为总统府正门，名“新华门”；拆除大清门至天安门间千步廊，由正阳门、棋盘街、东、西交民巷至天安门间全部开放。同时，打通了阻碍北京内城东西交通的三条干道：一

是拆除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的卡墙，打通了天安门大街；二是拆除神武门外的北上门和东、西角门，又拆除北海前东、西三座门，打通了朝阳门至阜成门间道路；三是拆除皇城北墙辟为大道，缩短了东直门至西直门间距离。

最先开放的禁苑是乐善园。此园原为康亲王赐园，又名“三贝子花园”，乾隆十二年（1747年）收为御园，光绪中叶曾加以修缮，1906年交商部设立农事试验场，⁵⁰建造了一批洋式建筑，将北门入口改为南门入口。这是中国第一座近代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园，又名“万牲园”。

民国建立后，中南海成为总统府；1928年后一度辟为公园。皇宫的端门至午门间辟为历史博物馆。午门内三大殿及文华殿、武英殿辟为古物陈列所，武英殿西边南书房改建为一座德国式洋楼——宝蕴楼。太庙开放，成为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后又辟为公园。1914年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1928年后名“中山公园”），在外坛挖池堆山，建造花房（“唐花坞”）、饭店（“来今雨轩”）、亭榭；又于1919年拆除位于东单大街的“克林德坊”，⁵¹移建公园内，名“公理战胜”坊。至1914年，除颐和园、北海、景山、玉泉山仍属逊清内务府财产（但已可售票参观）外，一切坛庙御园全部辟为公园；1924年后，故宫、北海等处也陆续开放。1922年先农坛（城南公园）外坛北部出售，成为街市民居；香山静宜园内建起了饭店别墅等新式建筑。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城市遭到严重破坏。正阳门城楼、箭楼被毁，大栅栏等商业区烧成一片焦土。鼓楼前、东单、西四等处繁华地段也遭烧掠残破。为整修市容及推行“新政”，从1906年起开始清除城内垃圾、整修道路沟洫，陆续重修被毁的建筑。正阳门至1916年才重建完工。箭楼由德国建筑师罗思凯格尔（Curt Rothkegel）改造设计，⁵²增加了登城梯道，立面上添了一些外国装饰。前门外商业区出现了一批洋式建筑。

民国建立后，1914年成立了“京都市政公所”主管城市建设，内务总长朱启钤为首任督办，颁布了一些城市建设的规章制度。⁵³首先整修道路，其次改造桥涵，疏通护城河及城内沟渠，填平主要明沟（如南、北沟沿）。当时规定道路为五等六级，一等甲级路宽25~30m、乙级16~24m，二等10~15m，三等8~9m，四等6~7m，五等5m。路面基本为辗压石渣，砌路牙，设排水沟。1916年开始铺沥青路面。至1927年，共有石渣路120万m²，沥青路30万m²。

1888年后于中南海安装自用供电设备，1890年宫廷里亮起了北京最早的电灯。1905年在正阳门内顺城街建立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城内陆续普及电灯。1919年在石景山兴建电厂，以后陆续扩建。1908年设自来水公司，德商经营，清廷督办；设备来自德国，公司设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水厂在东直门外和东郊孙河镇。⁵⁴1910年供水，但发展缓慢，大部分居民仍用井水。1900年丹麦人创办电话，1903年由清廷自办，后二年收购前者统一经营，至1936年共有17000门。1921年开设电车公司，1924年通车。⁵⁵

1924年溥仪小朝廷迁出故宫，1928年颐和园正式由民国政府接管，各大王府和

西郊私园也陆续出售，北京城近郊内已不再有封建王朝的特权禁地。随着现代市政的建设，北京这座带有浓重封建社会色彩的古城，正式进入了近代城市的行列。

（二）近代风貌的新区出现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古老的北京城中陆续出现了一些富有近代风貌的地段。

1. 东交民巷使馆区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英军占据了东江米巷御河西岸的醇王府，法军占据了台基厂南口庆公府，依照《北京条约》于次年在这两处设立了公使馆。其后，比照条约，俄、美、德、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奥匈九国也相继在这一带圈地占房，兴建使馆。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使馆区内开始驻兵。1901年《辛丑条约》正式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军队，分保使馆”；⁵⁰同时划出“使馆保卫界”的四至界限，即北至东长安街，南至城墙，西至兵部街，东至崇文门内大街。东、西、北三面修筑高大围墙，东墙外（东单广场）为驻军操场。于是，北京城中出现了一个城中之城、国中之国。

使馆区内的建筑，1900年以前多沿用旧有房屋加以改造，也有一些新建的单层外廊“殖民地式”建筑，后者以1892年建成的日本使馆为代表。1900年以后，各国使馆几乎全部扩建，又新建大量建筑，至1912年形成了一处全新的欧式街区。除各使馆和官邸外，还建有八国兵营，两所大医院，五座大银行，一座大饭店（国际饭店），两所俱乐部（法国、国际），几处大洋行和两座教堂（圣米厄尔、东正教堂）。当时中国的海关和邮政交给英国人经办，所以海关总税务司署和邮政总局也设在东交民巷内。

这批建筑中，除个别使馆仍沿用中国传统建筑加以改造外，绝大多数都是二十世纪初欧美流行的折衷主义风格，有仿哥特式（圣米厄尔教堂），中欧式（德华银行、比利时使馆），还有刚刚流行的“新艺术”式（意大利、荷兰使馆大门），但大部分是古典折衷式和夹杂着中国建筑手法的“殖民地式”。⁵¹

2. 崇文门——王府井商业街

自使馆区形成以后，其东面的崇文门大街一侧兴建了属于美国耶稣教美以美会的同仁医院，另一侧陆续建造起一批洋行、西餐馆和其它服务建筑，大都是西方古典折衷式风格；此街向北延伸，又与米市大街、灯市口一带的教会建筑联接，形成一段富有外国风貌的街道。

使馆区中台基厂直通王府井大街，街上陆续建造了一批洋行、银行、珠宝店、高档百货店和饭馆。1903年后，位于东华门附近的各类商摊集中到王府井东侧原来的练兵场一带，形成了东安市场，是为北京最早的综合性步行商业街。商场内的建筑大都是二层砖木结构，仿洋式门面，街道上搭有罩棚。

至二十年代末，由崇文门内、东单、王府井到东华门大街一带，集中了北京城

内最高级的洋行、旅馆、电影院、商场、舞厅，红灯绿酒，珠光宝气，一派洋式风貌。

在这一街区中，北京饭店最为触目。1903年建的5层砖木结构红楼，清水砖墙面嵌饰石刻装饰，作山花处理，科林斯（Corinth）壁柱高达三层。1917年在其西侧接建7层新楼，钢筋混凝土结构，法国古典折衷式；^⑤1931年改建顶层。直至五十年代中期，该饭店一直是北京地区层数最高、设备最好的旅馆。^⑥1903年建的红楼在七十年代拆除。

3. 正阳门（前门）外西侧商业区

前门外大街两侧的商业区在1900年被大火烧成一片焦土，1901年后陆续重建，不到十年又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二、三十年代陆续有所兴建。这一区的中心地段，北至西河沿护城河，南至大栅栏，东至前门大街，西至煤市街；局部向南至珠市口迤西。其中以大栅栏、廊房头条、门框胡同最繁华。

在北京城中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都最高的这一地段，有北京最早的电影院（大观楼），大部分旧式戏院和一座新式剧场（开明戏院）；有著名的“八大祥”（瑞蚨祥、谦祥益等）呢绒绸缎百货商店，高档服装店和鞋帽店；有新式银行（交通、盐业）和旧式钱庄银号；有北京最早的仿欧式多层大型百货商场（劝业场）；有一批著名的老字号（同仁堂等）；有大量旅社、酒楼、饭馆、食摊；还有集中在俗称“八大胡同”里的几十座“新式”妓院（也是民国初年官僚政客军阀进行政治交易的场所）^⑦。

这一街区的建筑面貌典型地代表了本世纪初北京商业建筑“洋化”的倾向。它们中除个别老字号的门面还保留传统形式外（如同仁堂、六必居等），大都采用了现代砖木结构，其中1918年重建的劝业场和1914年左右建成的开明戏院则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大部分商店、戏院、饭馆、妓院的格局都是二层围楼，中部天井上加罩棚。临街的立面，一部分摹仿圆明园西洋楼的巴洛克式，但也吸收了一些中国传统的装饰手法；另一部分采用传统的三间或五间砖牌坊构图，但加进了一些洋式线脚花饰。两者都表现出富有北京民俗特色的洋式风貌，^⑧1910年建的瑞蚨祥绸布店是其中典型的一座^⑨。

4. 教会建筑小区

1900年以后，基督教建筑在北京发展很快。其特点是，以教堂为中心，附近建造各种宗教、教育、医疗建筑，形成许多异国特色的教会小区。

其中，属于天主教的以西什库教堂（北堂）为主。这里是北京教区主教的驻地，除哥特式大教堂外，周围建有主教府、神甫住宅、修道院、若瑟院（修女院）、图书馆、印刷厂、医院和女子中学，大都为二层灰砖楼，折衷主义风格。南堂、东堂附近也有成片的外国式教会建筑，自成一处小区。

属于东正教的，主要集中在东直门内以北，有俄罗斯风格的教堂、住宅、修道院、学校。

属于耶稣教的，以崇文门内美国美以美会的亚斯立堂规模最大，1903~1909年